

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

徐
复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 MEDIA GROUP
JIANGSU EDUCATION & MED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 / 徐复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343-8199-7

I. 徐… II. 徐…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8552 号

- 书 名 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
作 者 徐 复
责任编辑 徐宗文 薛正兴 王华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 28 号(邮编 215557)
电 话 0512-52361778、5239138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21.375
插 页 3
字 数 470 000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199-7/G·7836
定 价 48.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260760, 83260768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徐复先生(1912年1月-2006年7月)



1985年4月,在河南开封与同行专家合影



1990年,在江苏昆山与弟子吴金华、王继如合影



2000年4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与弟子门生合影



2001年3月,在浙江杭州与朱季海、章念祖等合影



2002年11月,在江苏常州与弟子门生合影



2006年元旦,在家中与徐宗文合影

序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夜，友生朱小健教授忽然来电，语气沉重地说：“南京师大来电话：徐复老走了！”“走得很安稳，没什么痛苦。”接着急切地问：“怎么办？”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士复夫子走了，一定是身体不适了一段时间，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几年了，没能去拜望，虽然从几位友生那里能够不时打听到夫子的信息，但是这一次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

我问小健，告别仪式定在何时？我是希望所定的日子能让我离京奔丧。他告我：四天后，二十八号。查一周日程，是日参加教育部、国务院港澳办、团中央举办的京港澳学生交流营开营式，无法挪身，怎么办？思索片刻，告小健：“速发唁电，你代我赴宁，好好送先生，并安慰世弟世妹。”同时口述了唁电内容。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小健来了，带来两本影册，是他为我拍摄的石子岗告别现场的照片和别人所拍他参加悼念的情形。我看到，先生静卧于鲜花丛中，睡得很安祥；悼念的人们有我老友，也有所未识者，人人肃穆而沉痛。小健告我：学校极为重视先生的事，一切安排得很好，仪式简朴而庄重，许多学界师友忆及先生教诲，几乎无言相对……闻此，我也默然。小健所告虽详，也难以弥补我未能亲奠之憾哪！

时至二〇〇六年末，老友薛正兴来电，说徐复老的《晚稿》已经付梓，要我写一篇序。薛正兴先生是洪诚（自明）先生晚年的高足，我参加南京大学的训诂学研讨班时，他正在攻读，未及结业，洪先生撒手西去，徐复先生立即接过来为亡友完成未了的事情，所以薛兄是两位先生的学生，学问也兼承两家。按旧礼而论，我们有同门之谊。他后来任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多年来为弘扬传统学术和文化、支持训诂学研究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现在由他来编辑徐复老的最后文稿，在我看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现在他提出由我写序，自然不能推却。

的确不能推却。无论从我所受教，应该报答、纪念夫子说，还是从弘扬老一代学人的精神说，或者从补偿我未能赶赴夫子灵前一拜的歉疚说，都应该承担起这一任务。

夫子九十五岁高寿，按民间风俗应称之为“喜丧”，何况夫子是我国语言学界最长寿者。但是，当其事者谁能不悲反喜？夫子安祥而去，恰如他的一生，那样平和、宁静，这是可以告慰存者的；但是，一代名师毕竟是离开我们，离开训诂学而去了，谁又会因此而不悲呢？何况，夫子的学问或可得窥门径，夫子的为人却更难学；弟子们失去了人生导师，训诂学的一个时代也结束了。静言思之，德音盍忘！

说到先生的道德文章，不禁勾起我许多记忆。

我之识荆，是在一九七九年秋。受陆宗达（颖明）师

之命,得到萧璋(仲珪)师的支持,我于是年九月赴宁参加南京大学洪诚先生所办的训诂学研讨班。这是“文革”结束后教育部最早组织的高校教师培训活动之一。自明先生当然是主讲,士复夫子先为“助讲”,后来成了主讲。

我能走到自明先生门下,是非常荣幸的。第一次拜识先生是在一九六一年秋。这年五月,高校文科统编教材启动,学校派我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编写组。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编写组拿出了全书大纲和第一册样书(出版时第一册分成了上下两本)。大约九月,由统编教材办公室组织专家审议会。会议在前门外一个旅馆举行。到会的有吕叔湘、丁声树、殷孟伦、张清常、冯至、魏建功、洪诚、颖明师等先生,一时间国内汉语学界的大家泰斗云集一堂。作为初出茅庐的我,听会即是最好的学习,几天里一直兴奋不已。记得自明先生是会上发言最为积极、意见也最为尖锐的一位,所提最主要的建议是关于“是”字何时演变为系词。我读过自明先生论魏晋南北朝以前的系词和对王力先生《汉语史》中关于被动句式等问题的论断发表的几篇文章,没有想到,现在和王先生面对面了,他依然直言切磋。从那时我知道,先生除继承了章黄学说,还注重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并且融汇于训诂学之中,这是与恩师颖明先生略有不同的地方。可惜,会议时间紧,每天散会后我要陪送颖明师步行回家(先生家在宣武门外前青厂,从旅馆向西穿行几条胡同即可到达),再说,我是编写组中最年轻的一个(我戏称自己是“见习生”),没有机会也不敢单独请教各位先生。时过

近二十年，现在我竟走进了“洪门”，将在自明先生几前聆教长达三四个月，这是何等幸运！

颖明师在我行前赐诫：自明先生也是季刚（黄侃）先生的学生，“代我问候”，好好把洪先生的东西学到手。为迎接颖明、仲珪两师首届硕士生入学，我赴宁迟了数日；至，甫卸行装，即和几位同学去拜望先生。

十多年未见，先生显然老了很多，而且似乎更清瘦了。那时谁也不知道，癌症正在急剧地吞噬着先生最后一点精力。先生见我，十分高兴，当然免不了提及一九六一年的那次会议；同时谦逊地说，跟着颖明先生，何必到我这里来；既来了你就做班长吧。在这次拜见中，先生提出了一个我不曾想过、后来竟影响了训诂学科振兴的问题：应该筹建中国训诂学会！此后先生又多次提及，直至病笃之日。

第二天上课，先生神采奕奕，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不紧不慢，一连气就要讲两个多小时。事后从先生的助手许惟贤兄处得知，先生体力已经不支，每讲完一次课回到家已没了丝毫力气，甚至呕血。也正是因为先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吧，无意中使得我们和徐复先生往来更为紧密了。

士复夫子与自明先生既是金陵大学前后同窗，皆出自季刚大师门下，又是几十年的至交，南大办班，自明先生约请士复夫子讲课，当然立刻获得首肯。待自明先生精力日衰，士复夫子的课就增多了。

夫子是常州市武进县（今为市的一个区）人，虽几十

年在外，乡音似乎丝毫未改。第一堂课下来，说老实话，我基本没有听懂；问问同学，皆云似听外语。夫子并未察觉，讲时始终兴味盎然，手持讲稿，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每讲到一个例证，总要以“好了”作为过渡以继续推论。好在夫子语速缓慢，用不了几节课，大家即已适应，逐渐领会了所授引证之博、剖析之密，每言都展示了“训诂就应这样”的魅力。研讨班结业前，大家到苏锡常一带转了一圈儿，到了常州走街穿巷，处处不明其意的方音，一致的感受是：怪不得徐先生的话不易懂！

研讨班即将结束，自明先生课毕回到家，再次大量呕血，这才去住院。此前惟贤兄等一再劝先生去检查，得到的回答都是：上课要紧，等研讨班结束吧。待我们从苏州返回，惟贤兄告知：已无可医！归期在即，大家分批去看望，也只能环立床头唏嘘。那时人们对癌症的知识远没有现在这样丰富，我就没有想到先生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回到北京，向颖师面禀一切，颖师无语，神情黯淡，唯见微微颌首。不久，即接到讣告：自明先生已逝！

回想那一段日子，如果自明先生不办研讨班，或许病情不至于恶化得如此其速；但若不是办班，或先生并非重病之身，也许我们难得士复夫子亲炙，训诂学研究会也不会那样快地成立——世事或有不可料者。

士复夫子不但在老友病重时分担教务，接着又把老友筹建学会的无言嘱托承担起来，却自始至终没有从其口中流出关于接续老友遗愿的表白，而只是默默地奉献。

我和士复夫子接触得更为密切也是由筹办训诂学研究会始。

当时开设训诂学的高校没有几所：除南京大学、南京师大外，武汉大学、华中师院、山东大学、北京师大而已，而且多为自明与士复先生办的培训班之后开设的——在南京开的花，到各地结果了。但是，有训诂学基础或打算开设训诂学课程的学校还有很多。“文革”才过，各大学间的联系还不紧密，要把分散各地的学者、有志于此的人们联络到一起，已属不易，同时还要筹措经费、商议开会和学会所在地点、提出学会理事会组成方案、向主管单位申报等等，事繁而难。具体事情主要由我与自明、士复先生的弟子唐文负责，“大政方针”则时时向士复夫子汇报。

一九八一年训诂学研究会在武汉成立，颖师德高望重，被一致推举为首任会长。颖师在当选后动容地说：“这个会长本应由洪诚先生担任的。”而士复夫子则在成立大会的当晚，兴奋地对我和唐文说道：“好了，洪诚的愿望实现了。”他的确是在替亡友操劳啊！

士复夫子任副会长，却无形中成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会长。研究会成立后的头些年，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影响很大的活动：纪念古代训诂大家，恢复先贤故居，办培训班，开年会……凡是于振兴训诂学有益的活动，都办。跑得最多因而最累的，是唐文兄，我在为他那本呕心编撰却于其身后才出版的《郑玄词典》所写的序中已略有记述；许惟贤兄出力也不在少，尤其是在江苏举办的许多活动，他都为之先驱，多方奔走。而在他们二位背

后坐镇,有时还“率部”在烈日下一起奔波的,则是士复夫子。每当争取到会议所需经费或其他支持,唐文兄都来电或来信,缕述一老二少“活动”的情况和结果,戏称士复夫子是“丐帮头子”,一次还写了首打油诗。可惜,那些信和那首诗都没有留下来。我曾在《郑玄词典》的序中说过,唐文兄是“为训诂学会死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他,训诂学研究会就不会有那些年的轰轰烈烈,这是学会的老伙伴们尽知的,而他和惟贤兄的靠山士复夫子的操心、身体力行,却很少有人知晓。我想应该说,若没有自明先生的提议,训诂学研究会可能还要晚诞生几年;如果没有士复夫子的亲历亲为,也就没有训诂学研究会的规模,没有训诂学如此迅速的勃兴。

士复夫子每到一地,都是随遇而安,对于食宿绝没有任何讲究。——这也是老一辈学者的共性。一九八二年吧,训诂学研究会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于北京师大举行“训诂学教学大纲”研讨会。当时学校还没有像样的招待所,会议经费也有限,只租了校内人防工程改建的地下招待所。对此,作为主要筹备人,我愧赧有加。但士复夫子、殷孟伦、周大璞、周秉钧等先生却毫无怨言。士复夫子在地下室里边踱步边说:“这里蛮好,蛮好。”后来此事让党委书记聂菊荪知道了,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望各位老先生,说:“住在这里怎么行?学校再困难也要请老教授们换个地方。这可真是‘斯文扫地’了!”马上命党委办公室安排。后来老先生们住到学生宿舍改的留学生办公室

(汉语文化学院的前身),两人一间,其他人继续“扫地”。我知道,这些老先生们之不计较环境条件,既是学人本色,也有包涵年轻办事人的因素在。

体谅关心后辈似乎是士复夫子的本性。记得为筹备在高邮纪念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研讨会,我、唐文、惟贤陪奉夫子前往扬州、高邮。在扬州,住在市委招待所,大房间,十几张床,为照顾我们,不再安排别的人进住。扬州师院宴请,主人中有善饮的中文系主任赵航(南京研讨班的同学,后来任扬州教育学院院长),还有扬州师院的一位女老师。师徒四人只有唐文能喝几杯,遇到老友赵航,唐文不服输,一再叫阵。哪知那位女老师是不知醉的,几大杯下来,直喝得唐文落荒而逃。回到招待所,刚往床上一躺,马上要呕,跑到院子下水道,大吐起来。士复夫子紧跟着他,一边给他捶背,一边说:“喝多了,喝多了;吐了就好,吐了就好。”丝毫没有责怪之意。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或录像,留下这段师生之谊的最好写照。

后来人读夫子的论著,只能见其勤苦卓见,至于其为人之道,恐怕只有长年亲侍左右的人方能感悟。我这里的简述岂能表其万一!

夫子奖掖后进是出了名的。每次开会,年轻人多愿当面请益,有时唐文兄不得不跑去出面“逐客”,以免夫子太累,但得到的却是“反逐客令”：“还好,我不累,谈一会儿就休息,你去忙你的吧。”夫子的这种习惯从这本《晚稿》的一些书序中即可窥见一二。为年轻学者写序,总是

充分肯定作者的成绩，同时阐述自己对于该领域一些问题的见解，在我看来，这也就是以隐喻的方法指出努力的方向。他认为学人读书有得，就应该笔之于文，嘉惠世人。记得一次到夫子家拜望，说起他为某人的书所作的序，夫子曰：“写就好，写就好，总是有用的。”我于一九九四年到国家语委任职，不得不暂时疏离了训诂学，那几年写的大都是关于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和中文信息处理的文章，后来集成了《未成集》。当我把书呈送到夫子面前时，颇为惴惴，说：我“不务正业”了。夫子曰：“很好，很好。语言文字规范很重要，搞这个工作也是需要训诂学功底的。”勉勵有加，褒中寓励，这大概是所有受益于夫子者的共同感受吧。

夫子对其同辈学人的尊重更是不待言的。就我所亲见，对王力、黄焯、周祖谟、张舜徽、殷孟伦、殷焕先、周大璞、严学窘、蒋礼鸿、朱星、刘又辛、潘允中、濮之珍、徐德庵、余心乐、张拱贵、张永言、赵仲邑等，或每至一地必去造访，促膝而谈，或于会上，闻至先拜。其时，我与唐文、惟贤时常侍坐，得见老一辈之相亲相敬、士复夫子之虚怀若谷，今日回想，不禁对“显允君子，莫不令德”的诗句有了新的体会。

我常对学生们说，季刚先生门下各位先生均得老师之一体：刘贇：音韵，骆鸿凯：《选》学，颖师：《说文》，殷孟伦：《雅》学，范文澜：《文心雕龙》，洪诚：《礼》学……而士复先生则兼承，盖一九三五年季刚先生谢世后又到太炎

先生门下亲受润溉，且终生服膺高邨使然。这从夫子始则涉足汉藏对比，终以详注《尙书》，或可明其一二。至若赴台的林尹和潘重规先生，则一因局于小島，学者不得不无所不为，一因与海外联系方便而可较早致力于敦煌之学。观察“黄门”师承脉络，即可窥得近代传统小学发展之源流，亦可作为自己培育兴趣、选择学路的参考。

夫子一生所著，以考据解析古籍疑义为多，其细密严谨，探赜发隐，泱泱大观，非荒学如我者所可论评。其恬然外物，唯学是求，“只在乎祖国学术的成败”的境界，夫子口述的几篇文章已稍表露，况有夫子再传弟子王华宝《记徐复先生新世纪学术活动》在，皆非未能时随左右者所能道；但通观《晚稿》，我有一点还是要说：集中所收，多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作者，至八十、九十年代又经芟增补正，其间相距竟达半个世纪。这让我想到，夫子三四十岁时，读书已博，学养既深，精力亦佳，却适逢国难，颠沛流离，但潜心书海，写作不辍；五六十年代，虽居有定所，但运动频仍，心何以安，所为亦勉；待拨乱反正，已逾花甲，却精神焕发，不疾不徐，一生积累汨汨然出。学者与时代关系之紧密于此可见，学者须静而勿躁、持之以恆，亦于夫子身上得到验证。

《尙书详注》是夫子晚年的力作，这不但是其夙愿，而且酝酿多时。我年轻时也曾翻阅《尙书》，因难懂，且非语言文字学著作，便撻开了。夫子曾跟我说过作注的打算，这倒让我想起颖明师晚年奋力注《文始》的事。何以师辈